

日本文学十年回顾

庄 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这对日本文学或许是一件好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的文坛便开始进入低潮期,文学作品大多与现实生活脱节,乏善可陈。直到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人们开始对社会及经济问题进行思考,这才使文学再次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苦恼紧密相连。这种着眼于现实问题、反思社会制度、反映人们的心理状态的创作趋势延续至今。

新世纪以来,日本文坛出现了一些总结反思上个世纪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学运、恐怖事件)的优秀作品,尤其引人注目。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的日本文坛还迎来了在日外国人用日语写作的“越境文学”与女性视角写作愈发蓬勃发展的新形态。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不但进一步丰富了文学的主题与日语的语汇,也给文学领域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经验,展现了崭新的感受方式和个体经历。

新世纪日本小说:反思战争历史、反映社会人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文坛是从反思战争这一主题重新起步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中期,一大批战后派作家涌现出来,写出了众多诸如女作家壶井荣的名篇《二十四只眼睛》这种反思战争的优秀作品。这些对于战争的思考,帮助日本人理清了战争真相,并找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繁荣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关注点。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至今,讨论二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已经完全不见。这种空白以及客观的历史教育长期缺失,导致了近年来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暧昧不清。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战争责任、如何面对历史,是迈向新世纪的当代日本青年亟待探讨与认识的问题。

大江健三郎先生(1935—)的作品一贯以反

思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和人类的尊严这些萨特式的哲学思想为主题,也将日本人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这一问题纳入这些哲学主题的框架加以审视。新世纪以来,大江致力于探究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便荒废了的反思战争的主题,在近十年中创作了《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两百年的孩子》《别了,我的书》《水死》等多部长篇小说。《两百年的孩子》就是一部通过梳理历史反思过去以展望未来的作品。智障的大哥与健康的弟弟妹妹借助时间旅行器的帮助,亲眼目睹了日本近一百五十年来的各种历史场面,又前往未来看到了将来的场景。作品以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日本二百多年的样貌,反思了日本民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灵魂与肉体、物质和精神的特殊状态。

除大江先生以外,新世纪也涌现出一批对侵略战争问题特别关注的作家。他们延续了战后派作家们的创作传统,在新的时间维度上对战争问题进行了再度的反思和回顾。女作家村山由佳(1964—)的《星星舟》以一家三代六口人的视角,呈现了一个看似普通的日本家庭的生活面貌。曾经参加过侵略战争的爷爷重之的故事是其中的重点,提升了整部作品的厚重感。爷爷回忆了“入伍还不到半年,从人变鬼的过程”、韩国慰安妇的哭诉与仇恨以及侵略者的种种罪行。为了能在活着的时候将历史告诉年轻人,他终于答应外孙女的请求,受邀向外孙女的同学讲述了战争真相。该作品反复追问了国家和普通人之于战争的责任,获得了2003年第一百二十九届直木奖。之后,2010年又有一部探讨侵略战争主题的作品获得了直木奖,即中岛京子(1964—)的《小小的家》。小说借由一位当年在东京帮佣的老女仆的回忆,描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帝国主义日本发动战争前后的东京生活和时代氛围。老女仆回忆了野蛮的侵略时代东京狂欢般的振奋,而阅读了她写

的回忆录的外甥孙则谴责了当时日本民众随波逐流、姑息战争升级、甚至狂欢庆祝南京大屠杀的愚昧和疯狂。上述祖孙二位的两种视角在小说中交错呈现，对战争的历史观问题进行了严肃的探讨和思辨。

反思上世纪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作品在新世纪并非个别现象。除了对战争的反思，被称为“八十年代文学旗手”的村上春树（1949—）在新世纪也以其大部头小说《1Q84》总结性地反思了上世纪中期以来日本的社会结构、生存环境和人群心理，特别是对1995年策划沙林毒气事件，并给人们心灵造成巨大伤害的奥姆真理教所代表的黑暗的宗教模式进行了梳理与探讨。在小说中，宗教团体的运作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核心部分。《1Q84》从六十年代末学运时期的社会事件出发，讲述了一个由学运师生成立的公社性质的封闭团体最终演变为新兴宗教团体的故事。在这类新兴教团盲目狂热的教徒们身上不难看出奥姆真理教及其教众的影子（奥姆真理教也正是在1984年成形并开始活动）。作品还触及到少女作家获奖和文学推手现象、家庭暴力以及年轻作家面对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等等社会课题。

年轻一代作家中虽还未见有人写出上述作家那种具有历史视野和文学功力的作品，不过很多新生代作家也开始关注当前的社会生活及生存状态，并显示出非凡的创作实力。其中，中村文则（1977—）特别引人注目。在2005年凭借《泥土中的孩子》获得芥川奖之后，他又于2010年凭《扒手》获得第四届大江健三郎文学奖。中村描写的大多是社会阴暗角落里的人物以及他们的生存与心理状态，有人称他为关注黑暗面的小说家。评论家称，以暴力和性为主题的小说正在增加，描写和语言也趋于过激和刺激，这种描写对于在信息、影像中长大的一代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以暴力和阴暗题材为主题但紧紧抓住伦理的问题不放手。

除了纯文学作品之外，日本的大众文学领域也十分关注社会制度的缺陷并勇于揭露社会问题。比如在颇受读者欢迎的推理小说^①中，代表性的作品均旨在揭露导致犯罪的社会结构失衡以及制度

的不完善，并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揭露与反思。2005年获得第一百三十四届直木奖的东野圭吾（1958—）的作品《嫌疑人X的献身》就揭露了触目惊心的社会制度缺失和法律不完善等问题，发人深省。作品将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弱势女性单亲家庭的生存问题设置成为案件发生的前提，还涉及到流浪汉人群的生存状态等法律难以触及的边缘地带。第一百四十二届（2009年下半年）直木奖获奖作品、佐佐木让（1950—）的警察小说集《绝望的废墟》也是如此，小说集收入六个短篇，每一篇都揭示了作者家乡北海道不同地区近年来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通过警察仙道孝司的眼睛，反映出诸如煤矿的兴衰与人们的心灵创伤、渔业协会的组织模式问题、外国人大规模融入当地人群的问题以及阿伊努人的生存状态等北海道特有的社会现象。

越境文学：在日外国人用日语写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日本文坛开始出现旅居日本的外国人从各自的民族视角和在日体验出发、以非母语的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尝试，这类非母语的写作在日语中被称为“越境文学”。日本的“越境文学”与西方的“离散文学”略有不同。首先，由于最早的全球化移民浪潮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因此西方“离散文学”现象大规模显现时，离散文学作家大多出生在移住国并以该国语言进行创作；而日本并不大规模接受移民永久居住，因此在本世纪八十年代末产生外来人口写作的现象时，所有“越境文学”作家的日语写作都是非母语写作；其次，西方“离散文学”作家们大都出生在所在国并具有该国国籍，而日本的“越境文学”作家大多是在成年后去往日本，几乎没有具备日本国籍的“越境文学”作家。

新世纪以来，用日语写作的外国人越来越多^②，

① 日本的推理小说十分发达，分为专注于案情逻辑推理的“本格派”和关注导致案件发生原由的“社会派”这两种类型。

② “越境文学”不同于殖民时代的台湾作家和在日朝鲜作家的写作，并非是强制之下学习日语并用之写作，而是一种自觉、自愿的非母语写作。

颇多的“越境写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引起了文化界和出版商的重视。读者和文化界人士认为，“越境文学”不但刺激并丰富了日语的表达方式，还将作者原来民族性的思维方式带入日本人的视野，丰富了日本文化，拓展了日本人体验世界的维度，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理解，算得上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日语文学”。

新世纪以来，在“越境写作”的作家、诗人中，已有多位获得了日本读者甚至重要文学奖项的认可。旅日中国人毛丹青（1962—）的随笔集《虫眼看日本——中国青年所见的日本之心》一问世就引起了广泛关注。此著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描写了作者亲身体验的日本和在日生活，全书收录了《神户，我的城》、《竹内实先生》、《坐禅与风铃》、《夜山樱》等二十五篇随笔，语言优美，视角独特，有些片段甚至被纳入日本高考国语一科的试卷。在书末代跋《令人怀念的日语之美》中，非小说作家柳田邦男表达了对外国人能使用如此优美的日语而感到震惊的心情，并表示“近来，越来越多出生并成长于国外的人，开始用出色的日语写作小说和评论，成为作家……期待着他们刺激日本的语言活动”。^①此外，在日美国人阿瑟·比纳德（Arthur Binard，1967—）在随笔方面也表现卓著。他的随笔集《并不输给美利坚》从语言、文学、风俗、社会到国民性，以轻快的笔调集中比较了日美文化，广受好评。他在诗歌、俳句以及文学批评方面也颇有佳作问世，被认为是“越境文学”的干将之一。

在小说方面，自上世纪后半期开始便有一些在日外国人尝试用日语创作小说，取得了一定成就。比如意大利裔瑞士人大卫·佐比提（David Zoppetti，1962—）早在1996年便入围过第一百一十六届芥川奖；在日美国人、日本文学学者、小说家李维英雄（Ian Hideo Levy，1950—）1987年凭借《听不见星条旗的屋子》出道，成为最早的一批“越境文学”作家之一。他1996年入围第一百一十五届芥川奖，近来又凭借其作品《我是》在2009年入围了第三十五届川端奖（最终惜败给青山七惠）。近年来，随着“越境写作”日益成熟，一批优秀的外籍小说家引起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

注。其中，旅日华人女作家杨逸和在日伊朗人女作家西琳·内扎姆马菲最为引人注目。

杨逸（本名刘苈，1964—）在2007年凭借小说《小王》获得文学界新人奖，2008年7月又凭借《时光浸染的早晨》摘取芥川奖桂冠，成为芥川奖历史上首位非母语写作的外籍获奖者。杨逸在1987年二十三岁时来到日本，在日语学校学习日语后，进入御茶水女子大学本科主修地理专业。旅日二十年后的2007年，她凭借第一部作品、四万字的短篇小说《小王》获得了第一百零五届文学界新人奖，同时获得第一百三十八届芥川奖的提名。《小王》讲述的是在中国婚姻失败后嫁到日本的农村女子王爱勤的在日经历，以及后来她带着一队“结婚难”的日本男子前往中国相亲的故事。小说描写了中日两国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和对幸福的追求，语言诙谐幽默、清新明快。该作品关注了之前鲜有人了解的旅日华人的生活状态，以及跨国婚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中日两国普通人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评审委员池泽夏树认为，这部小说“给日本文学带来了我们都已经忘却的挚诚和朝气”。仅半年之后，杨逸的新作《时光浸染的早晨》再次入围，并最终夺得第一百三十九届芥川奖。作品讲述了1988年夏天进入西安某重点大学的梁浩远和谢志强从中国到日本的人生轨迹。作者生动地表现了二十年前中国大学生的学生生活、思想心理以及他们到日本以后工作结婚、适应社会的过程。小说的时间跨度从1988年到2008年奥运临近为止，在将近二十年的社会变化背景中叙述了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和精神成长。作品在八位评委中获得了五张赞成票。评委之一、著名女作家高树伸子表示：“杨逸的作品给我们呈现出非跨越国境所无法体会的东西……”

西琳·内扎姆马菲（Shirin Nezamzafi，1979—）也是新近备受关注的旅日外国人小说家。她出生于伊朗德黑兰，母语为波斯语，2000年来日，正式

^① 柳田邦男：“令人怀念的日语之美”，《虫眼看日本——中国青年所见的日本之心》，文艺春秋，2001年，第250页。

女性文学：具备女性自主意识的写作愈发成熟

二十世纪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面貌。社会对于女性自我表现宽容度的增加，令女性文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上世纪末的最后十年里，日本女作家获得各大文学奖项的比例有了显著的提高^①，获奖作品也大多探讨女性价值、自我体验和自我成长。本世纪初，大江健三郎曾在《昴》主办的一个文学座谈会上指出：“不远的将来，在日本，能够构建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这种文学世界的，唯有年轻女性们……”^②正如他所言，在那之后的十年期间，女作家们的确用她们的创造力写出了颇具思想性的小说，鲜活地呈现出一个个现代女性形象。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女作家角田光代（1967—）。她作品丰富，多次入围芥川奖和直木奖并获奖无数，无论是在大众文学还是纯文学领域都表现非常突出。角田光代关注母亲这一社会角色的生存状态，每部作品几乎都会触及女主人公与母亲的纠葛，进而引发对“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女”这些女性社会角色的深度思考。2006年获得第三十二届川端康成文学奖的短篇作品《摇滚妈妈》便以当代母亲的苦闷为主题。作品借由未婚先孕、回老家待产的女儿视角，描述了妈妈的状态：这位妈妈厌倦了多年来承担的妻子、母亲的单调社会角色，变成了拒绝履行为妻职责、终日聆听摇滚乐的女人。在家庭主妇众多的日本当代社会，很多家庭主妇希望能走出家庭，在社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认可，因此这部小说思考的问题可谓切中肯綮。2005年获第一百三十二届直木奖的作品《对岸的她》，讲述了一个身为

职业是系统工程师。2009年，内扎姆马菲凭借其描写两伊战争时期同学之恋的小说《白纸》获得了第一百零八届日本文学界新人奖，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文学界新人奖的“非汉语文化圈”作者。该作品同年还获得了芥川奖提名。这部青春小说将伊朗、伊斯兰教等日本人不熟悉的世界带入日本读者的视野，获得了很好的评价。2010年7月，内扎姆马菲又凭借新作《脉搏》再次入围芥川奖评选。《脉搏》讲述了一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极端情况下从无法互信到最终取得信任与谅解的故事。一位在日阿拉伯教师遭遇车祸被送到医院确诊为脑死亡，通晓两种语言的在日伊朗人充当了日本校方与家属之间的翻译。这位翻译能够体会双方的情感方式和做事方式，但却无法将这些微妙的文化差异翻译出来。作品借由这位两种文化之下的女主人公讲述出鲜明的文化差异，引人深思。芥川奖评委石原慎太郎认为，这部作品“写出了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日本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之一”。

诗歌方面，在日中国诗人田原（1965—）在2010年凭借其第二本日文诗集《石的记忆》获得了日本现代诗人协会主办、素有“日本诗坛的芥川奖”之称的H氏诗歌奖大奖，成为六十届诗歌奖历史上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非母语写作的外籍诗人。

随着非母语的日语写作日益成熟并获得认可，研究界也开始关注这一文学现象。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在2010年1月29日召开了研讨会，专题讨论了“越境文学”对日本的语言、文学、文化、社会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并在2011年春季出版了题为《用日语写作——文学创作的苦与乐》的研究专刊，其中收入李维英雄、杨逸的个案研究学术文章，还刊载了在日中国诗人田原、用日语创作的中国内蒙古诗人宝音贺希格（1962—）、在日伊朗人女作家内扎姆马菲等非母语写作的小说家、诗人的座谈以及相关学术探讨。因为日本属于汉语文化圈，日语中有很多汉字，评论家和很多作家都认为用日语写作的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给日语带来的良性刺激最为巨大，汉语的凝练和许多生动的表述，都将丰富日语以及日本人的感受方式。

① 仅芥川奖就有五位女作家获奖：1990年小川洋子的《妊娠日历》（104届），1992年多和田叶子《狗女婿上门》（108届），1994年笹野赖子《跨越时间的联合企业》（111届），1996年川上弘美的《踩蛇》（115届）以及1996年柳美里的《家庭电影》（116届）。

② 转引自原善：“总序：新小说思想或思想性小说的构建者——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

人母的郁闷主妇是如何在丈夫的冷嘲热讽中，从毫不起眼的钟点清洁工工作中找到自我价值，并最终走上创业之路的成长故事。角田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一些不适应传统社会规范、不认同现存社会价值、拼命追寻自己价值所在的棱角鲜明的灵魂。

唯川惠（1955—）的作品《间接恋人》里的女主人公也是一个棱角分明的女人。这部2001年第一百二十六届直木奖的获奖作品从女性视角出发观察世界，描述了女主人公由困惑到坚强，最终认清自己需要的过程。书中还探讨了同性恋话题，将这一社会禁忌以接纳认同的形式公开描述。

新世纪以来，日本文坛出现了大量关注当下经济低迷时期女性生活境况以及内心困惑的作品。2007年，第一百三十八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川上未映子（1976—）的《乳与卵》，探讨的就是女性的困惑，作品集中探讨了女人特有的部位——胸部与卵子的话题。由于生育而胸部走形的母亲目前在做朝不保夕的陪酒女郎，她想做隆胸手术使自己更具吸引力。女儿却无法理解母亲想借由身体改造而取悦他人的想法。作者借由女儿对乳房和卵子的苦苦思索，对乳房这一女性自然器官的社会价值进行了严肃而有深度的思考。女作家青山七惠（1983—）的作品大都关注年轻一代的生存状态，被认为是继承了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人文字风格的年轻作家。她在2007年凭借《一个人的好天气》获得了以新人奖著称的芥川奖，随即又在2009年以《碎片》获得了专门颁给成熟作家的川端奖，成为川端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一个人的好天气》描写了当今日本社会中比较普遍的现象：年轻人拒绝就业靠打短工维持生活，缺少理想和激情。芥川奖评委会认为这部作品以一种具有都市感的笔触刻画出主人公的虚无感和孤独，抓住了时代的脉搏，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年轻女性的内心困惑和状态。大道珠贵（1966—）2002年获得第一百二十八届芥川奖的短篇小说《咸味兜风》描写了女主人公在疏离的社会中空虚、郁闷的心理状态，探讨了当代女青年必须面对的生死以及婚姻与性的主题。第一百三十届芥川奖的获奖作品、金原瞳（1983—）

的《裂舌》则关注了都市新新女性的内心困惑，女主人公因为无法认同现有价值观念和社会秩序，内心茫然，为了追求活着的感觉，她迷上身体改造，最终把舌头一割为二，故事还讲述了她和两个另类男青年之间的痛苦关系，被称为“日本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江国香织（1964—）在其2003年获得第一百三十届直木奖的短篇小说集《好想大哭一场》中，每一篇都探讨了女性一生中大多会遇到的某种困惑——主妇的婚外情，情感萌动的十七岁少女的性体验，同性恋的浓稠情感，夫妇间鸡毛蒜皮的争执，失去激情的婚姻，单亲妈妈以及害怕衰老的女人等等。这些故事带我们走进女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体验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恐惧，进而思考女性的人生价值，以求能达成对自我的接纳和认同。

新世纪以来，这种致力于呈现女性内心世界、探索女性自我价值的女性视角写作，已不再是个别女作家的偶发行为，而成为一种写作趋势。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将女性作为主体而非附属于男主人公的“她者”来描述，在作品中辨析男权社会中很多被默认的规则和价值观念的真伪，并勾勒出现代世界里女主人公的形象和内心世界，为我们展现出更为合理的男女平权的社会模式的可能性。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经说过，“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二十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二十一世纪”。总体来说，新世纪十年的日本文坛不负众望，努力承担大江先生所说的“文学的责任”，众多尝试着总结历史、责问社会制度、反映时代心声、沟通文化鸿沟、增进男女平权的文学作品纷纷问世。这些文学上的努力，将会为大江先生所期待的“光明、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类尊严的”二十一世纪打下良好的基础。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